



“红色经典”背后的传奇人生

□黄桂元

回眸中国当代音乐史,王莘先生无疑应占有重要一席。他的一曲《歌唱祖国》以其跨越时空、响彻南北、“声”入人心的巨大影响力,成为一座朴素而高贵的艺术丰碑。不过,无数听众对于这首歌的旋律耳熟能详,却未必清楚歌曲的诞生始末和传播过程,对作曲家本人的生平概略更是知之甚少。而新近出版的《歌唱祖国·王莘传》(王斌、杜仲华),以翔实的资料积累和出色的驾驭能力,引领读者进入王莘沧桑而传奇的生命世界,再现了这位杰出音乐家的忠诚、清正、忘我、血性,及其精神大爱和人格魅力。

一般说来,中国传统文论面对作品,大体沿用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的批评路数,用陈寅恪先生的释义,便是“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事实上,“知人论世”的方法论也同样适用于各门类的艺术家,比如与革命岁月一路相伴,且具有精神与人格的垂范意义的王莘先生。

迄今,《歌唱祖国》问世已逾70载,王莘辞世也近15年。两者之间有着怎样血浓于水的隐秘传奇?《歌唱祖国·王莘传》这部传记还原并回答了这一切。全书有11章,记录和描述王莘重要的人生段落与生命轨迹,如同一扇扇内景不同的窗口,展示了昔日一个孤苦贫寒的江南农家少年,如何一步步成长为正气满满、有口皆碑的人民音乐家。本书的作者分别是王莘之子王斌和纪实作家杜仲华,采用得天独厚的一手资料,珠联璧合,互为补益。之前的许多年,我曾与王莘有过近距离接触,但由于种种原因,先生作为艺术前辈,再近的距离也使我觉出一种不无敬畏的遥远,我的心目中,王莘已被固化为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和特殊意味的音乐符号。沉浸于此书,不觉之间,神秘悄然消失,符号变得具象,先生的音容笑貌触手可摸,变得有血有肉,有筋有骨,可亲可爱,可歌可泣。

音乐经典和文学精品的生成规律,都会经历一个“发生学”的过程,通过时光的洗涤与美学的检验,最终得到历史的确认。如果有音乐之魂,可以发现,王莘与聂耳、冼星海是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关系。《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诞生于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歌唱祖国》则孕育于新中国旭日初升的日子,他们在不同历史年代都遵循用生命谱写乐章的艺术伦理,都创作出代表时代情绪的旋律强音,而进入“红色经典”系列音乐大师的行列。

《歌唱祖国》的问世,对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新中国,是时代激情的必然抒发,对于作者王莘,却是并非刻意的偶然

事件。当时的王莘32岁,不可能意识到,这首歌在共和国未来岁月将产生怎样难以估量、经久不息的共鸣效应。这个过程,在传记中得到真实、传神的细腻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于是,历史记住了1950年9月15日,记住了这日子中的难忘瞬间。如果时间可以定格,读者的眼前会出现这样几个斑驳镜头。事情还是应从1949年秋天说起。此时王莘担任新筹建的天津市音乐工作团团长一职,招生结束,合唱队也如期成立,却因没有铜管、木管等乐器而工作进度一再受阻。苦恼中,有朋友提到,北京某家当铺摆着不少无人问津的乐器,王莘便来了精神,揣着有限的经费只身赴京,通过一番与老板讨价还价,颇有收获,购得包括圆号、长号、小号、单簧管、双簧管、长笛在内的若干管乐乐器。他找老板要了麻绳,仗着年轻力壮,把单簧管、双簧管、长笛和长号、小号拴在身,一只手提着圆号,晃晃悠悠、丁零当啷地直奔前门火车站。从西四到西单,再到新华门,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站住了,一年前自己曾亲历的开国大典场面历历在目。恍惚间,灵感从天而降,几句歌词伴着旋律在心头涌动。王莘缓过神儿,气喘吁吁上了火车,放下乐器,从兜里掏出那支恩师冼星海赠予的自动铅笔,撕开一个“大前门”烟盒,匆匆铺开,记下最初的歌词和旋律。此刻,他正置身于火车飞驰之中,“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的句子顺势跳出,融入音符,一气呵成,如有神助。他的自吟自唱,如痴如醉,引来同车旅客的疑惑和惊奇,他解释自己刚写了首歌,要唱给大家提提意见,旅客们被打动了,听着听着,与他一遍遍同唱。如此,在从北京开往天津的一列火车上,一批素不相识的旅客,有幸成为《歌唱祖国》的第一批听众和见证者。

意外的是,这首歌投到报社却被退回,退稿信仅八个字:“国庆稿挤,暂时不刊。”原来,编辑觉得这首歌曲不太像民族风格,里面杂糅着西洋音乐的味道,与时风不符。有道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此后数月,《歌唱祖国》在基层群众中不断传唱,终于引起中国音协主席吕驥和文化部负责人的注意,认为是一首好歌,但歌词需要加工,其间提供修改意见的,既有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也有著名诗人艾青。

王莘出生于江南水乡的荡口古镇,通过传记,我们知道了那是个“文化昌明之地”,自古崇尚教育,王莘从小耳濡目染。他最早着迷于绘画,也表现出某些美术天赋,却因家贫只能放弃。如此,读书时断时续,继而过早地流浪异乡,以学徒谋生。1937年9月,接受进步思想影响的王莘带领“宁波战时流动宣传队”,徒步行走,经杭州、萧山、苏州、镇江、浦

新作品

口、徐州,一路千辛万苦,搭上西行的夜车,抵达西安,又有惊无险辗转向西北前进,最终到了延安,并进鲁艺学习,为一生的音乐抱负找到了方向,也奠定了基础。

在鲁艺期间,王莘与恩师冼星海先生曾有过鲜为人知的艺术合作交集。当时,冼星海读到诗人光未然的长诗《黄河吟》深受感染,有了谱成合唱乐曲《黄河大合唱》的想法,构思创作阶段需要有人帮忙搜集民歌素材,这个任务便交给了他很器重的学生王莘和陈强。冼星海在日记里,多次提到他与王莘、陈强一起研究搜集陕北民歌的事。陈强本是鲁艺音乐系学生,却因长相有特点,被调到戏剧系饰演恶霸地主黄世仁,成为日后公认的反派角色代表人物,多年后老友聚会提起往事,陈强还对当年的改行“耿耿于怀”,开玩笑地自嘲,我要是不离开音乐系,也和你们一样,成为中国响当当的大音乐家了!这类细节比比皆是,丰富了书里的人物形态与阅读情趣。

作品创作完成,王莘又参加了排练,多次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演唱。不久,王莘与许多鲁艺师生一起,被派往华北敌后战场。临别时,冼星海不免一番嘱咐,还送给王莘一支自动铅笔留念表达期待之情。王莘没有辜负恩师的希望,也正是用这支笔写出足以传世的《歌唱祖国》。艺术传承,根脉相交,冥冥之中,仿佛天注定。

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艰难岁月中王莘风尘仆仆,义无反顾,一直坚持用歌曲鼓舞唤起民众觉醒,鼓舞百姓斗志,其间还找到了一生的艺术知音与人生伴侣王慧芬。1952年春,王莘与作家巴金先生、剧作家胡可先生一同随全国文联创作组赴朝,冒着炮火硝烟,不顾险情深入前线慰问志愿军勇士,并在坑道里指挥战士合唱《歌唱祖国》。和平年代,王莘从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故步自封,满脑子都是怎样写出与时代同步的旋律,就连普通学校的校歌,请他谱曲也从推辞。

王莘在64岁那年,赴广州参加中国音协常务理事会议突发中风,救治还算及时,却从此与轮椅为伴。此后在与病魔抗争的时光里,他心心念念的永远是音乐。1994年,王莘计划拿出全部积蓄,却建了一个音乐奖励基金会的心愿。注资门槛需要10万元人民币,这个数目不能算高。然而就是这笔钱,却实实在在难坏了王莘。老人节俭一生,在家里常被视为“抠门”,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也只有5万元存款。为基金会筹钱,王莘心急如焚,东拼西借,煞费苦心。尽管家人对这件事意见并不统一,还是拗不过老人,儿女一同帮忙,终于凑齐了资金,却又被告知还需要缴纳两万元抵押金,王莘猛地想起早年国家发的公债,拿出抵押,终于过了注册门槛。

2006年的一天,已经完全失去语言表达能力的王莘,正躺在床上收听半导体收音机的新闻,突然,头顶上的监护仪显示,病人的血压、心跳、血氧饱和度都出现异常,值班医生立即赶来,查看病情和疑点,守候身边的王斌却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原来,刚刚播送了一条征集北京奥运会会歌的新闻,骤然间,88岁的王莘,梦想被唤起,心弦被触动,儿子贴身贴耳,一句句提醒父亲,您已经没有任何手段,跟我们沟通,嘴不能说,手不能写,您的想法,您的旋律,我们猜不出来呀……王莘先是目光凝住,满脸委屈,老泪不是如雨而下,也不是夺眶而出,居然是呈喷射状飞出来!这一幕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接下来,“此后几日子里,他每天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眼前充满迷惘和绝望。他不再看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至爱亲朋。任你如何呼叫,他也置若罔闻。”这个剪影般的场景令人唏嘘。音乐早已成为王莘生命的一部分,一旦失去创作能力,他自认为无异于行尸走肉,活下去的意义将不复存在。

关于王莘,作家兼文化学者冯骥才有过如下评价,“王莘的歌曲不仅是艺术,更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在祖国的山山水水,角角落落,凡是比较重大的活动,《歌唱祖国》这个人们熟悉的旋律都不会缺席。王莘未必必为音乐而生,却一朝投入,矢志不渝,呕心沥血,毕生献身,堪称一位用生命谱曲的音乐圣者。《歌唱祖国·王莘传》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切,应该说不负众望,功莫大焉。



怀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穆陶

今年7月25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逝世76周年纪念日。为怀念先生的高风亮节,我写了如下首诗:

爱满神州万众传,丰碑峙立铸人间。
 忧怀国粹真杰士,心系平民有至言。
 跋涉风尘归故里,倾情碧海向高山。
 仲尼千载魂魄在,应请陶公上讲坛。

怀念陶行知先生,不免心中充满激动感慨。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在国内或世界有着多么高的声誉,也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的地位与职务,而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他的思想、德行与人格,也由此生发出来。所以,他配得上“人民教育家”的称号。

1914年,24岁的陶行知与多名中国留学生去美国求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后,一些人在美国留下了,他则选择了回归,风尘仆仆,跋涉万里,回到了当时民穷国弱、风雨激荡的祖国。他惦记着人民百姓,忧挂祖国的命运前途。他要用自己的教育专业来改造社会,让国家富强,让人人成为“真人”。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他“教育育人”的理念。所谓“求真”,就是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能虚伪妄作,不能善恶不分;所谓做“真人”,就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修养的人、与人为善的人、有担当精神的人、为人民服务的人。这样的人,是需要有奋斗精神的。但这奋斗不是为“利欲”去奋斗,不是为“私心”去奋斗,不是为做“富的个人”去奋斗,而是为国家利益、为人民福祉去奋斗。陶行知注重“平民教育”,他要通过对广大民众如何做人的教育,来培养人性正正气,创造社会文明。他说:“我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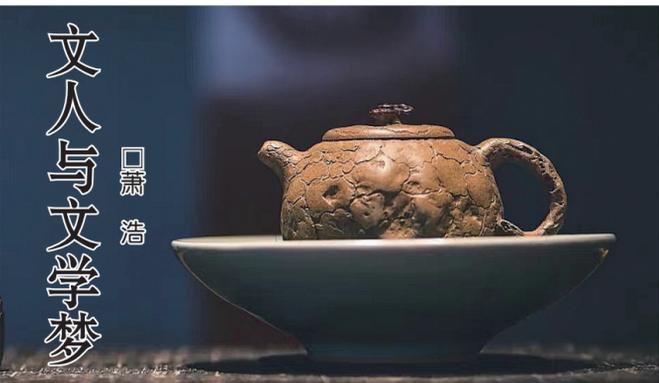
最为可贵的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从来都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而是付诸实践,身体力行的。他终其一生,只讲付出,不求索取,公私分明,一生清贫。“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郭沫若称赞陶行知:“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也是把目光放在广大民众身上的,这是中国的文化教育传统。陶行知大力提倡并履行“平民教育”,他认为广大民众思想素质的培养,是成就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文化根基。他的“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这一教育理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陶行知是一位民主斗士,始终站在当时民主运动的最前列,拥护共产党。他曾经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威胁,但他无私无畏,置生死于度外,坚持斗争。在陶行知的眼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如同“碧海”与“高山”,是他坚定的政治追求。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过度劳累而逝世,终年55岁。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在发出的唁电中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题词:“万世师表”。

行笔至此,不禁一股沉重的疑虑浮上心头:国之大者,教育为本。这样的一位为国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教育家、思想家,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社会民众中的许多人,对他却十分陌生,甚至不知其名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这是每一个中国文化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爱国精神,经过时间的淘洗,将证明出他更加隽永独特的价值。



文人与文学梦

□萧浩

文人为文,去除那些受命应酬之作,多为了圆却少时梦想——文学梦。

为什么要做文学梦?撇开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表述方式,有两点应是文人们都认同的,一是释放自己,一是感化世界。

释放自己,是释放自己的既有的闪光点,表达心之所向,以排遣自己的情绪,阐发自己的感悟,张扬自己的个性,从而达到树立自我艺术形象的目的。感化世界,是不仅在文学的沉浸中健康、壮大、刚强,而且让这种健康、壮大、刚强影响身外的世界,是对周遭的人与生活的响应。

做文学梦正如同做爱情梦,真与情是其最美丽动人处。然而,文学梦又高于爱情梦,且不说在对象的选择上,文学梦要自由宽广得多,文学梦生存的时间、空间也远远超出了爱情梦的阶段性、区域性,它与宇宙连在一起,它与历史连在一起,一切虚的假的阴暗的随意的伪饰的矫情的,都难有栖身之地,难得长久的生命。献身文学,不允许豪言壮语,不允许花言巧语,不允许胡言乱语,非至真至纯至性至情不可;献身文学,不允许“躲进小楼成一统”,“任尔东南西北风”,而须怀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非胸怀宽广、大公无私

不可;献身文学,不允许口是心非、投机取巧、见异思迁、心怀叵测,非“为人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不可。真善美是唯一的检验尺度,精深、广博是共有的热望与追求。职业作家如此,业余作者也如此。

因此,文学的爱与情是一种纯净了的放大的升华了的爱情。爱情的态度,要求做爱情梦的人们必须投入,必须牺牲,必须克制……这是没有强加没有压迫的自身的选择。

我们应该骄傲,我们是超然出尘的追梦人。我们高尚,我们无畏,因为我们的血很热;我们永恒,我们不朽,因为我们的血很多。我们的血很热,所以我们不平,所以我们痛苦;我们的血很多,所以我们奋起,所以我们冲锋……

不是有比別人更浓的自我意识吗?不是有比別人更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吗?

于是在众多可以释放自己、感化世界的正的邪的直的曲的明的暗的宽的窄的长的短的平的崎的路径中,我们做出选择,做起了文学梦。是我们意气风发、英勇无畏、前赴后继,寂寞却不孤独、悲壮却不凄惨地前进!

梦兮梦兮,心魂所系!痛哉快哉,好梦成真!

我的梦想萌生于上大专读书那个年代。随着文化提高,尤其逐渐有了汉文阅读能力,单纯而又纯净的心田里渐渐滋生了自己的梦想。而且不是一个,是三个。

一是警察梦。1963年我从蒙专毕业后,被分配到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公安局工作。在校学习时,随着文化的逐渐提高,我读书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我最喜欢的书是苏联的侦探小说,比如《形形色色的案件》这类作品。警察们爱国、爱人民,智勇双全,民众对他们充满敬爱。我心里下决心,将来要当警察。

梦想是天真的,纯朴的。然而,要实现它,却不像做梦那样简单。

参加工作几个月后的秋天,一位副局长带领我们三个人去抓捕一个杀人嫌疑犯。那是在成吉思汗陵园所在地霍洛公社。没等多久,嫌疑犯便赶着马车来了,他正御车的时候,我们便从四个方面包围了过去。他们三人都有枪,而我没有。

那个年代,在公安局上班的人家大都在农村牧区。快过年了,他们都请假回了乡下。大年三十下午,副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一支手枪放在桌上说,今夜你去街上巡查。说着把手枪推给了我。别说话,我看见枪就心跳。我对局长说不会开枪。局长说我教你,你就会用了。我从外边找来一个锅把说,我就拿着这个巡查吧……

这两件事对我的警察梦冲击很大,我的内心十分慌乱,感觉自己实在不是当警察的料。于是,半年后我申请调到了鄂尔多斯报社,实现了我的第二个梦想——记者梦。

从电影里,在社会上,我看到的记者都是手拿照相机,很有派头。报社出版蒙汉两种文字的报纸,不是日报,是周二刊,蒙文报汉译蒙稿件占的比例很高。蒙汉两个编辑部共29人,我所在的蒙文编辑部共7人。我来报社不久的一次蒙编会议上,负责蒙编工作的编辑说我不大会编辑也不会译稿。当时,我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缺乏工作经验,很忐忑。

时隔半年,汉编派罗子英去鄂托克旗苏米图公社采访,我随他去当翻译。那次采访很顺利,三四天就完了。我和老罗回到旗里,几个通讯员请我喝酒,席间我听到了一个信息:杭锦旗一个牧民与风沙搏



我的人生三梦

□乌雅泰

斗一天一夜,保住了百十来只集体羊。于是我准备去杭锦旗采访。到旗委宣传部打听后得知,那位牧民是霍洛柴登公社的,名叫吉仁太。吉仁太才20岁,家中就他和母亲两人。吉仁太与风沙搏斗保护集体羊群的时候正值春天,他早晨赶着羊群出牧时,天高云淡。但到半晌时候,突然风起云涌,沙尘飞舞,羊群惊慌失措,惊叫着四处乱窜。吉仁太的牧羊犬前拦后追也无济于事。风沙弥漫,吉仁太连眼睛都睁不开,更别说归拢羊了。第二天一早风沙减弱,吉仁太东奔西跑一夜,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在沙窝丛下找了些蒲公英充饥。中午时分风沙停了,他回到家才发现少了3只羊。下午他领着牧羊犬找回了这几只羊。

我在吉仁太家住了3天,把长篇通讯写完才回来。我把蒙文稿翻译成汉文,除自家报纸,还向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台投了稿。四篇稿都被采用,陆续发来稿费。这在蒙汉两个编辑部引起了很大轰动,年终总结大会是蒙汉两个编辑部合起来开的。李子野总编对我的采访和蒙汉文写作能力进行了表扬。从那以后,我就今天在蒙编,明天去汉编。

我写的书多了,不但长了知识,也敬佩作家的知识和表达能力,也产生了第三个梦想——作家梦。给盟委书记当秘书后,我的创作激情十分高涨,文学创作进入了双语阶段。上世纪80年代,玛拉沁夫出任《民族文学》主编,创刊号上要发一篇有关成吉思汗的作品,打来电话让我去北京写。《民族文学》刚成立,在陶然亭公园的慈悲庵里办公。因为是命题作文,我很难下手,每天都与老友——时任编辑部

主任的特·达木林一起喝酒。一天,玛老师训斥了我,说我只知道喝酒,一个多月了还写不出来。我坐在公园椅子上反思,突然看见一只老鹰从头顶上飞过,便有了灵感,一夜没合眼,完成了《一代天骄在这里长眠》,一早就送给了玛老师。

1981年,我进入内蒙古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班,并任班长。我们班15个人都是当时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者。每周三节课,除本校教授,还请师范大学和社会名流来授课,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除了听课,我们都努力创作。我在校期间完成了8万多字的中篇,并在《当代》上刊发。我发表了这部中篇作品以后,文学创作大步向前,走上了蒙汉双语创作道路。我的《祝你们幸福》《洁白的羽毛》《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匹骏马》等作品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等。我在80年代中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我1960年发表了处女作,60多年来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出版有《喇嘛哥哥》《达拉特·金色与绿色变奏曲》《十二生肖肖沙的故事》等八部作品。1983年从文研班毕业回来后,组织上派我到盟文联担任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并兼任汉文《鄂尔多斯文学》、蒙文《阿拉腾甘德》主编,直到退休。

我的人生三梦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我感到很欣慰。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还有梦外梦,那就是翻译家梦。随着蒙汉文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便开始进行蒙译汉或汉译蒙的文学作品翻译。蒙译汉的有《鼻烟壶里的故事》《最后一秒钟》等九部短篇小说,汉译蒙的有《绿风》《祝你成才》等八部。我的梦外梦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为推动民族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一点微薄贡献,我感到很欣慰。



星河

瑛